

兰州织呢局创办始末及其历史影响探析

秦弋然 谢达菲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放射与辐射研究所,北京 100850)

[摘要]洋务运动开展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段发展机遇期。19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是洋务派主张“求富”、重点兴办民用工业的时期,也是中国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时期,兰州织呢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创办的。探讨兰州织呢局创办的原因及作用,不仅有助于对洋务运动的研究,对相关纺织业历史的研究也会有所裨益。

[关键词]洋务运动;左宗棠;兰州织呢局

[中图分类号]K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6-0022-05

兰州织呢局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毛纺织厂,它的创办对于西北地区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它的创办也与开发大西北的先驱——左宗棠密不可分。本文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整合兰州织呢局创办的背景和历史原因,结合兰州织呢局从诞生到夭亡的史实,深入研讨兰州创办织呢局的历史影响及其失败的历史原因。

一、兰州织呢局创办的社会背景

(一)当时的中国社会

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清时代,已经进入了晚期。在明清封建社会中,也已经开始孕育着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在江浙一带的丝织业、棉纺织业中,都陆续出现了小户独立生产者被少数手工业工厂吞并的现象,独立生产者转而成雇佣工人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但是,伴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外国资本开始入侵,打乱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产生了两重作用和两种结果。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中国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催残了本来已经在中国封建社会内萌发起来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幼芽。而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作用下,又在中国嫁接发展起了资本主义机器工业。这就使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显得特别曲折和复杂。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造就了一大批买办资产阶级。他们不仅为外国资本主义掠夺中国效劳,而且与中国的封建官僚紧密勾结,成为勾通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桥梁。所以,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破坏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又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中国封建主义的中央政权,使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此后,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传统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封建经济迅速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发展。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洋务运动,到70年代以后,洋务运动在“求富”的口号下,开始创办民用企业。这些民用企业从形式上看,吸收私人资本入股,主要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从内容上来看,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进行经济核算,股份分红。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设立。从此后,洋务运动的重点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陕甘总督左宗棠在1878年开始筹办兰州织呢局。

(二)甘肃社会发展状况

要了解兰州织呢局的创办,就必须对当时甘肃社会发展状况有所了解。

据史料记载,同治五年(1866)前的甘肃,经济上“库贫如洗”,军费剧增,危机四伏,面临窘境;政治上,不仅以回族为首的甘肃人民起义动摇着封建统治秩序,而且“兵变”层出不穷,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整个统治机构面临瓦解的危机;军事上,由于要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军需骤然浩繁起来,八旗、绿营已溃不成军。人民群众承受着苛重的封建剥削,特别是广大农民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末日的清王朝在甘肃的统治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况。^①

除了以上的时代背景以外,兰州织呢局的创办还有其独特的条件。

甘肃手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同甘肃近代工业的产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甘肃盛产羊毛,因此,手工纺织业发展较早。据旧《皋兰县志》记载,早在秦汉之前,民间就有“拈毛成线,织褐为衣”的手工劳动,这种毛线衣称作“毛褐”。但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毛褐只是穷苦百姓在农耕之余织成的,自织自穿,并不出售。其实,这种毛褐是毛呢的初级产品,只不过这种毛褐是手工织就的,质地粗糙,并且表面剔不出绒来。到乾隆初年,毛褐生产技术有所改进,有“绒褐”之名,其中尤以姑姑绒为最佳,^②“造为织锦装花之

丽,五采闪色之华”,“一袍所费百金,一匹价值十余两”。^③织褐手工业有所分工,出现了脱离农业专门从事织褐生产领取工资的手工业者。“农民闲暇之余,捻毛为线,俗称褐线,待织褐匠来时,交给织褐匠。”这些织匠“自己携带简单织机,循游各地兜揽织褐,或计日给付工资,或计件给付”。农家织成的褐“有乡民带赴集市或县城出售者,亦有售褐小商人分赴农村零星收售者,亦有自己备用完全不出售者,亦有专营毛褐其目的在于完全出售者”。^④这种状况在兰州、临潭、皋兰、榆中等地都很普遍,尤以秦安之所产最为有名,其生产“不以自用为目的,已演变成为商业化之生产”。^⑤其产品远销兰州、天水、汉中、西安及四川等地。道光元年(1821),皋兰县知事周礁出资设立纺织公局,“造纺车机杼数十具,散给民间,劝民织绒布,并募客民妇能纺织者,任教导之役”,^⑥从而提高了纺毛织褐技术,这就为左宗棠在兰州创办甘肃织呢总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活动的加剧,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输入不但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品种也大大增加。光绪初年(1875),毛制品和毛棉交制品输入总量已有400余万海关两,^⑦以后逐年增多。甘肃的手工业也无例外地受到了打击,受影响最大的是毛纺、毛织业。“海禁开放,洋布输入极多,物美价廉,影响土产之生产”,“致毛毡之产销,沦为无人过问之趋势”。毛毡生产也是如此,“舶来品源源输入,我国固有之手工业多被摧毁,兰州毡房自不能幸免”。^⑧到21世纪40年代中期,兰州所存的16家毡房,资本最多的也仅500余元。当左宗棠看到这种情况后,不甘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任意掠夺,策划创办兰州织呢局,以抵制洋呢的输入。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由于甘肃地处内陆,交通不便,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和资源掠夺,陆路山重水复,只能靠骆驼、骡马才可通川、陕、青、新,水路因黄河水急礁多,大船无法通航,须靠羊皮筏运输,这种羊皮筏“只可顺河而下,不能逆行,藉此工具,可将烟制品运至沿河要埠,然后再以火车、汽车运销全国各地”。^⑨

二、兰州织呢局创办的历史原因

(一)发展西部地区经济

左宗棠来到西北以后,看到“甘肃地方痛苦”,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陇中寒苦荒俭,地方数千里,不及东南一富郡。”^⑩他又看到,西北盛产羊毛,而且价格低廉,“每斤值银一钱几分,每年可剪两次,民间畜牧之利,以毛为上,盖取其毛之利长,非若皮肉利只一次也”。^⑪于是,左宗棠想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利用西北盛产的羊毛资源织呢制毯,兴办民用企业,富民富国。

左宗棠把兴办民用企业视为“利民实政”,要为西北“开此一例”,正是为了实现“阜民”的目的。光绪五年(1879),他对友人写信说:“现筹开河、凿井、制呢诸务,以浚利源,阜民即所以裕国。购运泰西机器,延致师匠,试行内地,有效则渐推之关外,以暨新疆……目睹时艰,舍此不

同,又无以善其后,如是,则劳费虽巨,亦有所不辞耳。”^⑫可见他想通过引进西方的民用机器来改变西北地区落后状况的决心,亦见其“求富”观是以“阜民”作为前提的。

(二)培养后备人才

左宗棠认为,通过兴办兰州织呢局,还可以为中国培养技术人才,以利于将来发展本国毛纺织业。“今日之学徒,皆异时师匠之选,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⑬“将来有成,尤为此邦师匠所自出,不但数世之利也。”^⑭

(三)抵御外侮

左宗棠具有极强的爱国思想,他不愿看到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任意欺凌肆虐。他曾说过:“谓我之长不如外国,籍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⑮左宗棠认为:“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⑯他认为,外国人会做的事,外国人能办到的事,我们也应该能做到、能办到,因此,不能让外国人“擅其能”而在中国大展威风。“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所以,左宗棠不顾当时客观条件的艰难,亲自创办兰州织呢局,以御外辱。

(四)解决军队粮饷问题

左宗棠进驻西北,大批军队需要大量粮饷作为支撑。左宗棠军队的粮饷来源有三个方面:一部分来自西北本地,这部分主要是军粮;大部分粮饷依靠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各省供给。左宗棠在准备进军西北时,选员派将,专在汉口等地设了“陕甘后路粮台”;^⑰还借有部分外债,主要是购买军火。虽然这样,左宗棠还经常感到粮饷不足。加之西北气候寒冷,军队又多,军服、军被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创办兰州织呢局有利于解决军队的被服问题。

(五)增加湘系集团的利益

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也与他个人的利益以及整个湘系集团的利益是分不开的。他镇压了西北的回民起义,又扫除了新疆的阿古柏叛乱,在军事上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战事已平,如果能够在经济建设上大显身手,一方面能够使他本人更好地经营他当时主管的西北,另一方面,对于提高他自己的声望、增加他所属湘系集团的利益,都不无好处。

三、兰州织呢局的创办过程

1878年,左宗棠奏书清廷,请造兰州织呢局。经清廷批准后,便写信给时任上海采运局补运道的胡光墉,并附上赖长所画的机器图样,希望胡光墉能够在上海帮忙采购。胡光墉接到信后,立即与上海德商泰来洋行商量承办购机事宜。泰来洋行建议购置大型机器,左宗棠予以拒绝,主张“用其小者”。泰来洋行经理嘜哩吧征得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的同意后,由德国人帮助购买机器,招雇工匠,聘请技师。1878年10月前后,由德国亚亨地区织呢技师石德洛未购到织呢机器60余架,“将需用的机器载运来华”。织呢局

全部机器（其中包括少量机器用于西北地区其他建设，如开河、掘井的机器）共有4000箱。《申报》在光绪五年（1879）三月十八日报道：“兹闻向外洋购取之各种机器业已来沪……该机器共有大小箱笼一千二百余件。”又《捷报》1881年9月2日载“兰州织呢局致北华捷报函”则说这是“四千箱机器”。^⑮据杜经国、张建昌在《左宗棠在甘肃经营的洋务事业》中的解释，认为从时间上判断，前1200余件为先期抵华的机器，后一数字则为兰州织呢局总共拥有的机器数量。

这些机器主要包括动力设备及两部蒸汽机，一部为24匹马力，另一部为32匹马力；制造设备为织呢机20台以及一些次要机件；另还有梳毛机三套、纺线机三架，每架360纺锭，共1080锭；清洗设备有清毛、烘毛、漂染等机器。

1879年春，这批机器从德国运到上海，再用上海招商局的轮船拖运到汉口。然后又雇用小木船，把这批机器运到湖北鄂樊老河口和河南龙驹寨两处，再由陆路经西安运至兰州。“惟鄂、樊、龙驹、西安各处，运解分合，迟速不齐，故到有先后。”^⑯到同年10月，才将第一批机器运到兰州。直到1880年5月，才陆陆续续把全部机器运完，这足足花了一年的时间。这些机器“件数繁多，体式高阔，寻常舟车，不便装载，拟设法改造，运解来甘，亦未可限以时日”。^⑰平常的木船装不下，就要特别定做大木船用来运输。而陆路运输更是艰难万倍，“遇山开路，遇水架桥”是常有的事情。在当时那样的运输条件下，只得人背、马驮、大车载。大车装不下大件的机器，只得加以改造，或拆分机器，或改造道路。村落不能过，只得拆让；山中峡道，两面碰壁，只得凿宽再走，真是一路“车驮络绎，邪许成雷，汗浆如雨”。^⑱

至于兰州织呢局的厂址选择，亦有些许争论。其址选在兰州通远门外2里的地方（今畅家巷），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前路后营旧堡。由于“堡式狭小”，当时有人提出，这里与福州的马尾船政局相比，实在相差太远，是否另择他处。而左宗棠则力排众议，认为“就前路后营旧堡为宜”，并指出：“论者动以闽中机器厂为比，实则不然。彼仿造轮船，百物之所为备，工繁料钜，奚止百倍于此，此则开河、凿井、织呢，只各是一事耳。恶在其阔而侈也。”^⑲于是，按照左宗棠“局面不宜大”的原则，利用前路后营旧堡原有建筑，又盖了一些房屋，共计230多间，作为厂房及华洋工匠的住处。

当时所建的兰州织呢局分东厂、西厂、中厂和机器局四个分厂：东厂又分纺线部和织呢部，安装着相应的各种机器；西厂主要是负责把刚运来的原料——羊毛加工处理后，送东厂纺线织呢，再把东厂织好的毛呢进行漂染、光等，做完出厂前的最后工序；中厂为动力和运输厂，有汽锅房、大车房等；而机器局则是负责检查和维修各厂全部机器的。

兰州织呢局共雇用德国人11人。^⑳其中石德洛末为洋总办，李德和满德为总监工，另有翻译2人。这11个洋人组成一个领班，统一管理。

华工则有工匠和艺徒之分：工匠是聘请而来；艺徒是根据左宗棠的指示，从陕甘勇丁中挑选而来。“所部陕甘勇丁，有赋性灵敏堪资学习者，应令其挑赴该局，专心学习，由该镇（赖长）派人指示，俾其相观而喜。将来有成，尤为此邦师匠所自出，不但数世之利也。”^㉑“勇丁之聪慧者，兰州可留心挑选拨入，将来必有可用之材，正不必于士流中求之。”^㉒他们按照左宗棠的旨意，精心挑选“聪颖俊达”^㉓的陕甘士兵，到总局学习织呢。

兰州织呢局除华洋工匠以外，还有总裁（即厂长——赖长）1人、委员10人，另有其他佣工若干人。到1880年5月全部机器运到兰州时，厂房、华洋工匠住房均已建成。他们就此开始安装机器，经过五个月的时间，机器安装就绪，于同年9月16日开工生产。^㉔

此厂从筹建到开工，历时共两年多。经过艰苦努力，中国第一个机器毛纺织工厂——兰州织呢局终于创办起来了。

四、兰州织呢局的夭亡

1880年9月16日，历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兰州织呢局正式投产。但兰州织呢局开工后，生产经营的情况并不如预期的那样理想，本地的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产业优势，甚至经营陷入重重困难，弊端丛生：机器不能全部投入生产，并且时有停歇，生产不能正常进行，产品质量也不能过关。

根据同年年底左宗棠透露：“兰州织呢局结构宽敞，安设机器二十具，现开织者尚只十具。”^㉕开工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不妙，到第二年就更不景气了，“安设机器二十具，现开织者尚只六具”。^㉖由此可知，产品自然也不会有多少。事实正是如此，每日仅产呢八匹，每匹长50尺，宽5尺。就是这么一点产品，产品质量也是每况愈下。开工之初，左宗棠还说：“所成之呢渐见精致。”^㉗第二年初便不得不承认：“其质虽略逊于洋呢，然亦可供着用。”^㉘就是说，仅能穿用而已。两年之后，时人便称：“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完全不能出售。”^㉙

左宗棠1880年调离兰州后不久，织呢局便开始衰败。1882年，洋技工合同到期回国。而中国的工匠们还没有全面掌握技术，加之后来锅炉破裂，动力无法解决。最终，兰州织呢局在1883年新任总督谭钟麟命令下停办，次年更是被完全废弃，中国第一个毛纺织工厂就此夭亡，左宗棠建设甘肃、富裕百姓、发展经济的美梦也就此破灭。

五、兰州织呢局夭亡的历史原因

左宗棠兴办的兰州织呢局非但没有如他所说使“甘人自享其利”，反而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损失。织呢局“费银百余万两，旋经后任废弃，钜款尽付东流”。^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悲惨的结果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先进的生产设备同封建的企业管理之间的矛盾

近代工业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首先由一批封建官僚引进中国，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因为主持者的封建

本性,在企业管理中,必然沿袭封建官场的腐朽办法。这些所谓的“官督商办”企业在筹建和经营过程中,无疑都曾经得到过官府的保护和扶持,也正是因此,这些近代民用企业才能冲破封建枷锁和落后势力的重重阻挠。同时,“官督商办”也将衙门和官府的腐败作风带到了企业的经营中,这大大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正如后世有人在回顾了兰州织呢局兴衰的过程后,感慨地说:“其失败原因有二:总办以工厂为官府,故局内滥委不重要之职员,但知支薪而不知办事,尤其多非专门人才,一也;有时因权利意见、党派分歧,视工厂为孤注而不惜牺牲之,二也。”^④这些评论道出了新工厂中存在的旧官场积弊:冗员充塞,非业务性开支庞大,官员以学业务为耻,不肯屈尊从事实际工作;视工厂为私产,任意措置,这同近代的大工业生产很不适应。这不仅仅是兰州织呢局存在的问题,也是甘肃近代官办工业的通病,也是这类工厂不景气的主要原因。

(二)工厂对主持者的依存关系导致了“人走茶凉”的局面

作为由封建官僚引进中国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封建的管理体制势必会造成工厂对某些主持工作的大官僚或官府的依附和从属关系,他们一切仰赖官府,从创办开始就取得了官府倾尽全力的协助。而一旦官员迁徙,这些由他们一手创办的工厂就因失去了原有的经济和政治支撑而处于停顿状态,甚至倒闭。兰州织呢局以及同期的兰州制造局都在左宗棠离任后停产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三)兰州所处地区的客观条件限制

首先是原料问题。左宗棠在筹建该厂时,原以为“此间羊毛、驼绒均易购取”,能够保证供应,但事实并非如此。诚然,甘肃养羊业原来是比较发达的,但是经过长期战乱,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劳动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根本无力蓄养更多的羊只,由此造成织呢厂得不到足够数量的生产原料。羊毛的质量也成问题,“很粗很杂,弄得每天得雇四十个人挑拣羊毛,每天(每人)只能拣两磅”。^⑤织呢局开工两三个月时,“一百斤羊毛中,只有十斤能织上等呢,二十斤能织次等呢,五十斤只能织毡子和床毯……剩余的二十斤完全无用,全是杂毛和垃圾”。^⑥这样质量的羊毛利用率很低,自然织不出左宗棠想象中与洋人所织相媲美的毛呢。

其次是水源问题。织呢须经过清洗、漂染等工序,需水量很大,为保证质量,所用的还必须是成分较纯的水。早在选厂址时,德国技师就提出水源不足的问题,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开工后,问题便逐渐暴露出来。因为水源缺乏,即使找到了一点水,也是含碱量很高的水,这样的水源条件不仅限制了每天织呢的数量,也大大影响了织出来的毛呢的色泽和质量。

以上两点原因导致了第三个问题,也就是市场问题。

在织成呢布以前,羊毛的成本已经很贵,毛质和水质又不过关,使呢质受到影响。这就使产品变得质次而价高,根本不具有市场竞争力。再加上长期战乱,甘肃人民贫困不堪,购买力弱,“均尚棉布,而呢不甚销,贩至他省,又以运费较贵,似不合算”。^⑦织成的呢质量甚差,根本没有销售市场。

最后一点则在于甘肃当时思想的落后。甘肃长期以来“寒苦荒俭,地方数千里,不及东南一富郡”,能够集资到巨额资金的富户不多,且这些人僻处内地,对于洋务的新事业还少见寡闻,满脑子的陈旧思想,在没有见其利而得其惠之前,是断然不会冒着倾家荡产的危险去经营新兴的机器工业。甘肃也没有一批投靠外国侵略者发了财而眼界又比较开阔的买办商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兰州织呢局的兴办。

正是以上几点客观原因限制了兰州织呢局的发展。而在这样沉重的肌体上又附着了近代官办企业不可避免的弊病,发展谈何容易?企业本身存在的浓厚的封建性是制约近代工业发展的重要原因。纵观洋务派所经营的近代工业,无不患有封建衙门式的管理这一通病,诸如在企业中任意安插亲信,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意识,管理人员的自身利益与企业的成败无关等。如果将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来看,兰州织呢局的衰败似乎并不是一个偶然。

此外,左宗棠在兴办兰州织呢局的过程中主观主义的瞎指挥引起的后果也值得我们注意。他盲目引进机器,缺乏通盘打算。比如最初对织呢局的建造,事先并无一个计划,连购置到多少机器心中也无数。对于织呢不但要机器,还需用羊毛、绒线、煤等原料、燃料,但对这些原料、燃料供应是否充足的问题却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和细致考虑,而是主观地认为西部地区原料、燃料丰富,工厂的运作自然不在话下,可是在工厂建立起来之后还是出了问题。建厂前,左宗棠对呢子的销路并不甚了解,就大做其“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⑧的美梦,却没有看到当地人民均尚棉布,呢子销路不佳的问题,致使产品积压,难以销售,不仅影响了扩大再生产,连最基本的生产都不能保证。

综上所述,兰州织呢局的夭亡,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与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有关,也与甘肃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人民的思想境界有关,更与其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密不可分。

六、兰州织呢局的历史影响

关于兰州织呢局的历史影响,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兰州织呢局是左宗棠从事洋务运动由军用工业向民用企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近代中国最先创办的机器毛纺织业,是毛纺织业近代化的开端。由于兰州织呢局是官办企业,经费由西征协饷开支,陕甘总督委派总办,生产民用呢绒,故其应是国有资本性质的近代民用毛纺织业,而且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国有资本性质的毛纺织业。在处于 100 余

年前的当时,左宗棠将沿海近代化事物带到陕甘,使穷乡僻壤的西北地区人民呼吸到近代新鲜事物的空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开创之举。这个行动,从历史趋势说,是正确的,体现了社会发展方向。不能因其失败而抹杀其首创之功,以及将近代科学技术输入落后的西北地区之功。在甘肃这块偏远的土地上,是左宗棠最早办起了近代工业,客观上也起了开化风气的作用,对于促进甘肃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加速甘肃封建经济的崩溃,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在这里处处强调一个“试”字,就是让官办做试验、当示范,用官办引领商办,以便使近代科学技术推而广之。可见,左宗棠创办洋务的想法和做法在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都是有促进作用的。

左宗棠在甘肃创办洋务事业,其主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有着促进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因素。众所周知,李鸿章等人创办近代工业并不是要中国人民使用机器,相反,他对中国人民会使用机器这件事感到很忧虑。他对民间使用机器设置重重障碍,对于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私人投资经办近代企业的热潮加以种种限制,实行封建性的垄断政策。而左宗棠的思想则与此大相径庭,他不但主张移入西方的近代生产技术,对保护和促进这种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极为赞赏,他说:“时议歆泰西之富强,以安常习故为非策,群思舍旧而图新,却于彼此情实究少体会……西法听商经营,官收其税,故所为多成,国计亦裕。若由官先给成本,并商之利而笼之,则利未见而官已先受其损。盖商与工之为官谋,不如其自为谋,其自为谋也,尚有工与拙之分,其为官谋,更可知也。”^⑨他认为,西方科技之所以日新月异、向前发展,就

是因为他们摆脱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采用了“听商经营,官收其税”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政策。中国要向西方学习富强之道,就必须走这条“自为谋”的道路。在19世纪70年代,这条道路必然会导向资本主义。而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左宗棠更是力加倡导,他说:“惟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如官倡其利,民必羨之,有的实之户不搭洋股者,呈资入股,应准承课充商;官本既还,只收岁课,不必派员管厂。”^⑩这同李鸿章要将私人资本“必渐归并官局”正好是截然相反的路线,但这是顺乎时代潮流,是符合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

左宗棠在甘肃苦心经营10年,到京师后仍魂牵梦萦的洋务事业虽然全部失败了,但他的努力值得肯定。因为,他经营这些事业的主要目的是出于爱国和利民,其指导思想也基本上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左宗棠办洋务,可以说直接继承了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将其贯彻到实践中去。左宗棠深知“阜民即可以裕国”的道理,认为只有增进民力,国力才能得以振兴。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他才会不惜财力、物力和人力在兰州兴办织呢局,这一点值得肯定。

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左宗棠在兰州创办织呢局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这是他思想和行为的落后性,在织呢局创办过程中的盲目指挥也导致了生产的困难,穷尽西北地区人力和物力创办一个并不具有市场价值的兰州织呢局,其意义对人民而言无疑弊大于利,而且人民在织呢局创办之后并未享受到真正的利益,大多数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其根本出发点而言,一个小小的兰州织呢局根本不足以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历史的车轮还在滚滚向前。

[注 释]

①张海声:《左宗棠在兰州》,《兰州学刊》,1986年第6期。

②⑦林隆:《中国第一个机器毛纺织厂是怎样创办起来的》,《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③《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9。转引自林植:《甘肃近代工业略论》,《甘肃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④⑤⑥⑧⑨甘肃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甘肃之工业》,甘肃银行总行1944年版。

⑩⑪⑬⑭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中国史学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第444页、第444页、第440页、第441页、第445页、第445页、第441页、第445~446页、第446页。

⑫左焕奎:《开发大西北的先驱——左宗棠》,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⑬⑭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78页、第379页。

⑮戴慕贞:《左宗棠评传》,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3年版。

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95页、第902页、第900页、第903页、第901页、第905页、第899页、第899页、第905页。

⑲《左文襄公全集》书牋卷22,第445页。

⑳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1984年版。

㉑当时兰州织呢局所雇用的德国洋匠,一说7名,一说10名,一说13名。据杜经国、张建昌《左宗棠在甘肃经营的洋务事业》(《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考证,当时左宗棠雇用的德国洋匠,有织呢的,有开河的,还有干其他事的。而织呢局的洋人共11人。

㉒㉓《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7,第47页。

㉔㉕《甘宁青史略正编》卷30。转引自林植:《甘肃近代工业略论》,《甘肃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㉖㉗《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7,第26页、第25页。

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63,第55页。